

結論

本論文主要透過文獻資料與考古材料，以及學者的研究成果，對商代的王權及其發展之全貌作綜合的、系統的探討。

在早期國家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中，「王權」幾乎等同於「國家政權」，所以有關王權的形成與發展，實與古代國家的起源有密切的關係。人類社會政治組織一旦達到國家這一階段，就有了正規且固定的政治領袖，並擁有「強制性的權力」以實施統治。所謂「強制性的權力」，主要就是法律與武力，而主要的施行者即所謂的「王」。

在中國古代歷史的演進上，夏商時代已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，而商代的史料較夏代大為完備，對於考察古代王權的發展問題，提供了較為成熟的條件。

有商一代六百餘年漫長的歷史，其間「王權」的內涵如「王」的職位及其具有的權力，顯然並非一成不變。《史記·殷本紀》描述商代自湯建國後，商王國經過了幾度的盛衰，這一現象實即當時王權強弱的反映。商代的王權，實經歷了一番由「諸侯之長」走向「諸侯之君」的演變發展過程。

古代部落或早期國家的領袖，常常因為領導作戰勝利而提昇其地位與權力，古文字所見到的「王」字，最早出現在商代的甲骨文中，而其字體形態則象斧鉞之形。斧鉞本為兵器之一，又可用為治軍的刑具，以此象徵軍事統帥權的斧鉞構成「王」字，說明中國古代世襲而握有最高行政權力的「王」，是以軍事首長為其前身，而王權的產生，則與戰爭有直接關聯。從文獻考察，商湯建國之初，接連征伐的勝利，必使其「王」

的權威有所擴張。成湯時代這一優勢國力，可能維持了一段相當的時間，反映在考古學上，就出現了像藉以宣示王權統馭四方的大型青銅方鼎，以及鄭州商城、偃師商城這類規模雄偉的王城都邑等遺存。其他考古發現的許多早商都邑，其規模格局多帶有濃重的軍事防衛性質，反映了建國初期軍事活動的重要與需要，即如湯所都之「亳」，似即是伴隨著商族的軍事擴張活動而逐一修築的結果，考古發現早商都城頗具規模的現象，顯示早商王權已有一定發展的程度。

再者，商初可能還處在一種「方國」(部落)聯盟的狀態，商王真正能掌握的政治權力似不能以後代的眼光來看。相傳湯之建國，得力於伊尹輔助，伊尹負以見湯之“鼎”，可能是藉以控制「溝通天地神人」的關鍵性禮器，象徵湯具備王天下的資格；再以伊尹放太甲及太甲之後王位的傳承以兄弟相繼居多的情況看，在王位繼承人選的決定上，商王似乎並沒有絕對的主導權，也未有穩定的「制度」，其間，神職人員對於商王的權力尚有干預的作用，因此，早商時期的王權發展尚未達到「制度化」的階段。

商代中期即中丁至盤庚期間，國力幾度衰微，王朝與方國聯盟的關係，似出現了嚴重的危機，史稱「比九世亂，諸侯莫朝」，王權的發展亦必因此遭遇相當的阻力與挫折。從商王譜系來看，這段期間，王位繼承的方式，不僅不在單一的系統之內，且呈現出多樣的變化，同時又有王都屢遷的現象，這樣的的政治環境，對於王權的建立與穩固，有很大的阻撓力量，應是可以想見的。考古材料反映出來商代中期青銅方鼎的發展亦無顯著進展，這些現象無疑地都反映了王權的發展呈現出極不穩定的狀態。

從卜辭觀察，商朝約自武丁以後即施行「封建」的制度，逐漸形成以商王為中心的君主封建制國家，王朝的國力因而有了明顯擴增的跡象。武丁時期的征伐卜辭記錄顯示，武丁即位之後多次發動大規模征伐戰役，積極地拓展疆域，不但有效地擴張了王朝的統治疆土，征服了眾多的方國，迫使許多的方國臣服於商王室，因此商王的權力與地位亦必隨著這樣的情況而提高。此後商王領導一個發達的行政體系、統領龐大的軍隊系統、對其下屬擁有極大的刑罰之權，並且擺脫神職人員的控制，掌控祭祀的主導權，將神權與世俗的行政權結合在一起。王權的發展至此方才進入較為完備的階段。

武丁之後，商王對於疆土的開拓與方國的兼併，仍在持續進行，敵對方國有減少的趨勢，這個現象顯示商代王權的擴張，到了殷商末期仍未停止。康丁或武乙之後，商王譜系上清楚地呈現單一系統的傳承，從此以後商王的傳承進入了父子相繼的階段，商代王位在王室單一直系之間傳遞，王權必也在這樣穩定的環境中發展；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王位傳承穩定地在王室單一直系之間傳遞，亦未嘗不是王權居於絕對優勢有力操縱的結果。

在考古上所見，武丁時期正是商代青銅工藝的鼎盛時期，特別是婦好墓的發掘所得，幾乎可以作為殷墟青銅工器高水準發展的代表，其中尤以巨大的方鼎重器 - 如司母戊鼎、司母辛方鼎等最為特殊；目前所知商代的青銅方鼎，幾乎有三分之二以上屬於這段時期，青銅方鼎的蓬勃發展，似乎是在商代王權高度發展的背景之下而展開的；從殷墟遺址中發現的宮殿基址及王陵大墓的數量來看，這裡確是盤庚以後諸王所居之都，而殷墟都城龐大的規模及豐富的文化內涵，顯係建都於此的時間

悠久、長期累積所致，反映了這一時期王權的穩定發展。商王不再遷都的事實，也說明了王權漸趨於穩固的狀態。商紂時擴建王都範圍，以及剛愎自用、為所欲為的行為，似亦反映了商代晚期王權高度擴張的現象。

商代王權的發展，應還有其他探討的角度，如殷商晚期青銅器上多有類似族徽之銘文，由其族名之確定、所屬地區、及鑄銘青銅器之種類規格等方面，應有助於商代方國地理、商代諸侯、商代禮制等問題之討論，但是由於這方面的資料龐雜，尚有待進一步的統整，作好基礎研究工作之後，才能對商代王權的發展作更進一步的探討。